

我在现场

● [美] 威廉·李海 著

● 马登阁等 译

罗斯福、杜鲁门顾问回忆录

I was there



● 华夏出版社

我在现场

〔美〕威廉·李海 著

马登阁 石 雷 张若玲 等译

祝立明 校

华夏出版社

1988年·北京

I WAS THERE

by

Willim Leahy

Whittlesey House, Division of the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Inc., New York, U. S., 1950

我 在 现 场

〔美〕威廉·李海 著

马登阁 石 雷 张若玲 等译

祝立明 校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125印张 372千字)

1968年4月北京第1版

198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册

ISBN 7-80053-138-4/K·016

定 价：3.05元

作者简介

威廉·丹尼尔·李海(1875—1959年)1897年毕业于海军学校,从1927—1939年曾在海军担任多种职务,1939年退役后任驻波多黎各总督,1940年11月—1942年7月任驻法国维希大使,1942年7月—1949年3月,分别任罗斯福与杜鲁门的私人参谋长(亦称白宫参谋长)。此书回忆的是作者1940年11月—1945年9月的亲身经历。

此人经历非凡,在美国历史上创下了数个第一:作为总统参谋长,迄今为止,他是唯一的一人;第一个被授予海军五星上将军衔;事实上的第一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译者前言

这部回忆录是李海根据他的日记撰写而成。是研究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略的一部权威性实录，尤其是有关参谋长联席会议方面的材料极为罕见。

本书共23章，前7章回忆他在维希期间的情况，李海称此地为“外交前哨”是很形象的。这部分叙述较琐碎，却是了解贝当、达尔朗和赖伐尔等人内幕的极好资料。8—23章是叙述1942年4月至1945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所见所闻。这期间他的主要任务是为罗斯福，后来是为杜鲁门处理日常军务和某些重大外交事务。主持参谋长联席会议制订军事计划，主持英、美联合参谋长会议协调和指挥盟国军事行动，参加盟国最高级政治和军事会议，他还主持过英、美、苏和英、美、中三国参谋长会议。

作者有关对华问题的回忆占有相当篇幅，是了解战时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材料。

原书的附录部分因与正文重复较多，故未译出。正文中有个别地方略有删节。

本书各章节译者：第1—5、7章张若玲；第8—13章石雷、祝立明、马登阁；第6、14—19、22、23章马登阁；第21章叶金魁；第20章张若玲、石雷、马登阁；索引石雷、祝立明；全书由祝立明统校。

目 录

第一章	我在现场	(1)
第二章	新的使命	(7)
第三章	轴心国提出额外要求	(20)
第四章	俄国——晴雨表	(41)
第五章	法属非洲的混乱	(56)
第六章	战斗的岗位	(65)
第七章	完成使命	(78)
第八章	最高统帅部在工作	(99)
第九章	全速推进“火炬”行动	(113)
第十章	北非登陆与达尔朗	(132)
第十一章	卡萨布兰卡和华盛顿会议,来自中国的 危急信号	(150)
第十二章	第一次魁北克会议,准备中的“霸王”战役	(173)
第十三章	轴心国开始崩溃	(188)
第十四章	开罗、德黑兰会议,美国食言	(202)
第十五章	盯着太平洋,登陆诺曼底	(231)
第十六章	太平洋战场诸问题,第二次魁北克会议	(263)
第十七章	1944 年的总统选举,欧洲胜利在望	(285)
第十八章	雅尔塔	(312)
第十九章	不祥之兆	(349)
第二十章	杜鲁门上台	(373)

第二十一章 盟国间的纠纷,为波茨坦会议作准备 (394)

第二十二章 波茨坦..... (422)

第二十三章 原子弹、细菌战与和平 (462)

第一章 我在现场

《我在现场》一书，是我从1940年11月出任驻维希大使至1945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近五年时间的记事。当时我的职务使我在最高统帅部中处于决策的位置。有时我们是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击败敌人的。我的回忆基于我参加过的许多次历史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战争的进程被制订，通往和平的蓝图被规划。这些会议包括：

华盛顿会议，1943年5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这是9次战时盟国会议中的第4次。在这次会议和此后的几次盟国会议上，由于温斯顿·丘吉尔顽固地推行他的旨在保护大英帝国势力的各种计划，以至于同罗斯福总统在如何迅速击败希特勒这个最基本政策上，不能取得一致意见。

魁北克会议，1943年8月在加拿大魁北克省举行。击败希特勒的全球战略已经确定。英国最终同意美国跨过英吉利海峡进入欧洲的重大步骤。

开罗会议，1943年11月至12月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罗斯福、丘吉尔与蒋介石达成一项他们从未遵守的协议。由于某些客观原因，总统与首相未同土耳其人达成任何协议。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执拗的英国盟友竭力想把战略重点转移到地中海方面，由于当时已经制订出横渡英吉利海峡，接近德国本土击溃希特勒的计划，对此，美国统帅部认为不值得优先考虑。

德黑兰会议，1943年12月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首次会晤。三国领导人共同制订了战胜德国

的计划。在这次会议上，他们还就某些战后问题交换了意见，例如关于波兰边界问题。

第二次魁北克会议，1944年9月在加拿大魁北克省举行。即将全面展开的太平洋战争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可能使我改变这样一个信念：我们无需在敌人本土实行大规模两栖登陆，就完全能使日本投降。但陆军部的意见则与此相反。

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召开。三国领导人讨论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问题。我认为，这完全是一次不必要的让步。但罗斯福深信，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可以确保在实现其战后团结和平的世界梦想中得到他们的真诚合作。

波茨坦会议，1945年7月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这是最后一次战时盟国首脑会议。美国新任总统哈里·杜鲁门和英国新任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在同苏联领导人艰苦的谈判中上了第一课。苏联在欧洲的势力这一严酷的事实，深深地触动了所有与会者。

在上述战时盟国首脑会议中，我被指令出席几乎所有重要的军事性会议。此外，罗斯福和杜鲁门还多次要我参加只有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在波茨坦是杜鲁门）以及他们的少数高级顾问出席的政治会谈。

这里回忆的许多事情源于我同罗斯福，其后是杜鲁门讨论军事和外交政策的谈话。其中大部分讨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大量的历史性政策正是在这里制订出来。有时，我们在总统的私人汽车或座机上、在海德公园、在卡托克廷山庄的“世外桃源”、在某一旅馆、或在海上进行讨论。我们讨论的事情包罗万象，远远超出总统军事顾问的职责范围。从重大的国内问题，诸如人力危机（指战时美国劳动力的缺乏——译者），到罗斯福提名副总统人选等都涉及到。

作为美国三军中的一名高级将领，我主持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并负责把总统对国内外重大战略和政治问题的基本思想传达给它。作为东道主，我还主持了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这个联合参谋长会议包括美国 and 英国各军种的最高将领。尽管我们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一些会议上也和苏联军事顾问坐到一起，但我们同苏联盟友却不曾有过类似的有益合作。

总统军事顾问的主要职责是选择各种重要的军事情报，及时准确地提供给总统。同时还要被军界、外交界和民间许多人士的种种要求所纠缠，从中筛选出有关军事方面的情况，并提出我的意见或设想向总统汇报。很自然，由于和两位战时总统有着工作上的密切联系，人们纷纷前来找我，以便通过我的努力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中有战败国和流亡政府的代表，也有我们的盟友，他们来到这里往往是请求我们提供更多的美元、武器，有时甚至还要求我们派遣军队。

1942年7月我受任总统军事顾问之前，从1941年1月至1942年5月，罗斯福曾委派我担负了一项战时最引起人们争议的外交使命，出任美国驻法大使，当时正是维希的贝当政府处于摇摆不定之际。我在维希这一年多时间里，轴心国控制的法国新闻界送给我种种绰号，但从未有一句赞美之辞。

当时我们同维希政府间的关系极其微妙，甚至我们随时做好撤离的准备，把汽油和给养隐藏在路途中，以备猝然离去时使用。

我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交往始于1913年。那时他从纽约搬到华盛顿，在伍德罗·威尔逊政府中任助理海军部长。

1915至1916年，我在海军指挥海军部长通信船“海豚”号。罗斯福曾数次乘“海豚”号出海巡游，从那时起我们彼此成为好朋友。我还到过他在海德公园和坎波贝洛的家中作客。那时，他是个英俊、爱好交际、体格健壮、办事果断、具有非凡精力、又富于创造精神的年轻人。他通晓美国海军的历史，熟悉海军的指挥系统

和作战系统。他酷爱航海,是个非常称职的小艇水手和领港员。在我们密切的交往中,我钦佩他对事物的鉴赏力和对历史的洞察力,以及他对于国际事务的广泛了解。几十年来,我们之间深厚的友谊始终不渝。

自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们之间的往来很少。1937年1月,总统任命我为海军作战部长。此后,我们经常讨论建立一支可靠的海上防卫力量的问题。由于他个人的爱好和助理海军部长8年中获得的经验,使他对于海军问题产生了许多卓越的见解。

罗斯福竭尽全力避免战争,其努力令人敬佩。但他谙熟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他深信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以防备敌人从海上对美国的入侵。他知道我们已经作好准备,我们的海军正有效地执行着防务计划。然而,日本袭击珍珠港造成美国海军部分的瘫痪,这使得美国暂时缺乏足够的海上力量与日本海军相抗衡。

罗斯福知道,除非纳粹势力出乎意料地崩溃,否则,希特勒对于美国的生存无疑是一种威胁,战争最终将不可避免。1939年7月下旬的一天,罗斯福在他的书房举行了一个小型仪式,授予我一枚军功勋章,并对我说,“比尔,一旦我们被卷入战争,请你立即回来助我一臂之力。”1940年,罗斯福担心战争降临到我们头上。当时,我正准备前往波多黎各担任该岛总督。但实际在珍珠港事件前,我们未被卷入战争,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那时我在维希任驻法大使)。四天之后,也就是12月11日,德国和意大利双双对美宣战。此时,总统仍要我留在维希。不久,1942年5月,我奉召回国。至此,皮埃尔·赖伐尔已经完全控制了贝当政府。两个月以后,我被任命为陆、海军总司令的参谋长,作为总统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中的私人代表,全面负责起复杂的战时工作。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溘然去世,副总统杜鲁门继任总统。

出于某种原因，我立即向新总统提出辞职，但他拒绝了我的这一请求。作为一个军人，我服从总统的命令，并以同样的职务继续协助杜鲁门工作，直至1949年3月21日。

我与杜鲁门总统一起工作了近4年，无论从那方面看，我都认为杜鲁门的确是一位出色的总统。他在处理问题以及同其助手们相处中既正直，又能体谅人，和蔼可亲。他像他的前任一样经常向我征询有关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意见，很注意听取旁人的建议，并对作出的决定承担全部责任。

他的行政工作方法不同于罗斯福，一旦制订出决议，他便按规定对应负其责的政府部门授以全权。我认为，他的决定往正是正确的。某些方面之所以成果不佳，其原因在于具体执行部门的失职。

罗斯福对各种建议同样也经过慎重的考虑，然后再作出决定。所不同的是，他并不信任某些执行部门，因此总是事事亲自去落实，必要时派他的私人代表进行协助。某些执行部门业已制订的决议草案也常常交给哈里·霍普金斯或我修改，然后由总统亲自审定。这使得罗斯福对于他所制订的各项决议和官方文件了如指掌。

我极为赞同杜鲁门授权予执行部门的工作方法，但在理解一些部门文件的确切含义上，我却时常遇到困难。

尽管两位总统的领导作风各异，但他们都是处理世界性危机的卓越领导者。两位总统在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国内外事务上，同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我能有幸同这两位总统共事，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荣幸。我认为，两位总统在同与我们的生活观念格格不入的敌人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献身精神，博得了同他们一道工作的全体人员持久的热爱和崇敬，他们将名垂青史。

在多灾多难的5年中，从出使维希担负新使命之日起，我从未

间断我的日记。这些“备忘录”并非专为本书而写，它们为我在瞬息万变的战局中把握今后的工作起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这些“备忘录”全部是我个人的笔记，其日期和史实完全准确，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和人物的评价在本书中将屡屡引证。基于当时可资利用的消息来源，某些材料难免发生舛错，但我已经尽力而为了。笔记中使用密码的情报已经译出来。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这些电报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为了保守当时使用过的密码的秘密。

为了对那些正在玩战争历史拼图游戏的历史学家们有些小小的帮助，有人曾劝我将这些个人笔记整理出版，要我对于那些至今仍是谜的问题作出解释。但我想埋在卷帙浩繁的官方文件堆里从事乏味的工作还是留待他人去做吧，这里记述下来的只是我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

第二章 新的使命

1941年1月5日星期五午夜，在一些法国人看来，这也许是90年之中最寒冷的隆冬时节，这一天，新任美国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到达临时首府维希。

从马德里开始的北方之行，我们乘坐的火车肮脏拥挤，没有暖气，整个旅途充满着沮丧，除了在我们内心中还有点热情之外，对这一任命，比我44年生涯中所接受过的任何一项使命，恐怕是最没有兴趣的。

就在6个星期以前，当时我和夫人正在波多黎各岛圣朱安总督官邸的餐厅里用早餐，我的副官进来递给我一份罗斯福总统刚刚发来的电报。罗斯福在电报中说：

“我们在法国正面临着一种日益严重的局势，法国现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很可能说服贝当元帅与德国人缔结条约，如果让其成功，将会大大增强轴心国反对英国的力量。

“甚至还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法国加入反对英国的战争，尤其危险的是庞大的法国海军舰队被德国人控制。

“此时此刻，我们迫切需要在法国有一位能完全取得贝当元帅信任的大使，而贝当是目前法国政府中反对彻底倒向德国一边的一个有力人物。

“我认为，你是完成这一使命最合适的人选，你能够直接同贝当元帅交谈，而你在我们海军中的地位无疑将使你对于那些公开敌视英国的法国海军高级将领们产生极大的影响。

“所以我希望，你能接受去法国的任命并准备尽早起程。”

罗斯福的电报完全出乎我的意料。1939年我已经64岁，刚到退休年龄后仅几个月，我就辞去了海军作战部长的职务。接着，总统派我出任波多黎各总督。

那时我们还没有参战，但罗斯福极其担忧，尽管他竭力想避免，我们最终还是会被卷入这场战争。实际上，1939年9月我离开华盛顿之前，他就告诉我，他担心日本可能在1940年会采取某种行动，到那时，美国要继续站在冲突之外将是不可能的了。无疑，总统的估计在时间上是错误的。

不久便是1940年春法国的溃败。英国孤立无援地进行着英勇的抵抗，而美国人则极为缓慢地才认识到，这场战争的成败与我们自己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1940年9月，宣布了美国以50艘超龄驱逐舰换取英国纽芬兰和西印度群岛基地使用权的协定。在我看来，美国海军力量的增强，加强了我们的防御能力，在防止敌人入侵，保障美国安全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40年7月初，在阿尔及利亚的奥兰港外，英国人击伤了两艘法国战列舰“布列塔尼”号和“敦刻尔克”号。这次该死的战斗后来给我带来了不少麻烦。但在当时，如果我是英国舰队指挥官的话，也会痛击那些法国舰只的。可是在波多黎各，我们自然得严格维持法属西印度群岛领地的现状，尤其是离该地不远的战略要地马提尼克岛。无论如何，在收到总统1940年11月17日电报之前，我丝毫没有想到会立刻投身到这一令人大伤脑筋和使人沮丧的使命中去。

当时波多黎各的情况正在逐步好转，即使并非如此，总统的要求也必须优先考虑。我在总统来电的背面草草写道，我愿接受任命，并在一周内离开此地。回电通过海军通信系统直接发到总统那儿。那个周末，他正乘“波多马克”号军舰在海上度假。

11月28日，我和夫人离开波多黎各赶回华盛顿。当我们驱车驶向码头时，数千名群众排列在圣朱安街道两旁，人们怀着惜别

之情前来送行，使我为之感动。途中我又接到命令，要我于12月2日上午在纽约港上岸，从那里直接飞往华盛顿，总统想在中午以前见到我，然后他将作一次海上长途旅行，前往马提尼克岛附近，观看停泊在法国德堡港的法国航空母舰“贝亚恩”号的演习。总统将乘坐美国巡洋舰“塔斯卡卢萨”号前往。本月晚些时候，我将乘该舰去里斯本，从那里转道去维希。

在总统书房两小时的会见中，我们讨论了我的任务，总统扼要地说明了政府的对法政策。象往常一样，罗斯福熟知所要讨论的问题。这是我同他在一起，特别是我担任海军作战部部长时的印象。他具有特殊的才能，既善于纵观全局，又能明察秋毫。那天上午，他逐句逐条地向我讲述了法国于1940年6月21日同轴心国签署的苛刻的停战协定。

他特别强调我必须取得贝当以及达尔朗海军上将的信任。关于皮埃尔·赖伐尔总理我们谈得不多。就我看，在我们谈话的那天（12月2日）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黑彼得”（赖伐尔的密码用名）会在两周内被贝当突然踢开，而为达尔朗所取代。

我的主要任务是尽可能地使法国站在我们一边。这意味着要使贝当相信，法国的最高利益在于击败轴心国。鉴于1940年底的军事形势，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罗斯福敏锐地判断出贝当可能不信任其内阁成员，也并非总是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特别是对赖伐尔和达尔朗这两人。因此，我必须随时提醒贝当，我所掌握的他的部长们可能对他隐瞒着的事情。罗斯福指出，普通的法国人仍然热爱这位84岁高龄的老元帅，尤其是在目前的情势下，贝当的话便是法律。贝当甚至在法令中曾使用忠于“我们”。

一项十分困难的任务是要向贝当清楚地表明，我国将继续向英国提供战争中的全部短缺物资。罗斯福了解法国人中普遍增长的反英情绪，尽管如此，我仍需要说明，美国将尽一切努力去援助那些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

总统希望我能象“看门狗”一样，防止法国向轴心国提供超出停战协定条款所规定的任何援助。他知道，维希政府的要人们相信轴心国必胜，出于自身的利益，他们希望站在胜利者一边。因此，我有义务向人们指出，轴心国的胜利将意味着法兰西帝国的彻底崩溃，使法国降低到附属国的地位（我后来发现，只有为数很少的法国人对德国人俯首贴耳，甘愿希特勒把法国变成他所“宠爱的”属国）。

罗斯福回顾了 we 曾多次得到过的有关法国海军的保证，总统和我都非常清楚，法国海军对于西半球防卫的重要性。但我必须得到新的保证，绝不能使这支海军落入德国人之手，我必须强调，海军的存在对于法兰西帝国的生存和主权的恢复是何等的重要。总统已经直截了当地告诉维希政府，如果海军屈从于轴心国，法国将失去美国政府长期以来的友谊。每当情况需要时，我都要重申这一告诫。总统希望我同时还要提醒法国政府，应当尽量避免针对英国政府的敌对行为。

他知道，作为一名老水手，我会同法国海军高级官员友好往来，这使我有更多机会表明我们的意见，防止他们的舰队被轴心国控制。

我们讨论了向法国非占领区运送粮食的问题。我必须说明，我们愿意救济饥饿中的法国人民，但英国的胜利关系到我们的最高利益。因此，在我们向英国施加压力解除对法国的封锁之前，我国政府必须确保运送到法国的救济物资丝毫不会有助于德国人。总统要我立即进行谈判，并通过红十字会向法国儿童运送药品、罐头或奶粉。

关于法属西印度群岛和法属圭亚那问题，我们将继续执行维持现状的政策。我们将坚持，停泊在这些法属港口的舰只留在原地不动，我们还必须得到保证，援助马提尼克岛的 2 亿 4 千 5 百万美元不会落入德国人之手。